

Z O U J I N M A O Y U S H I

八十回望

走近茅于軾

岑 科 傅小永 郭玉闪 周克成 等◎编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Z O U J I N M A O Y U S H I

望 八十回

走近茅于軾

岑 科 傅小永 郭玉闪 周克成 等◎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十回望：走近茅于軾/岑科，傅小永，郭玉闪，周克成等编著．—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10

ISBN 978 - 7 - 81135 - 289 - 4

I. 八… II. ①岑… ②傅… ③郭… ④周… III. 茅于軾—回忆录
IV. 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0121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暨南大学出版社排版设计中心

印 刷：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21.75

字 数：330 千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1—15000 册

定 价：38.00 元 (附赠 DVD 光盘)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言

最近两年，“茅于軾”这个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人所关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春运火车票限价有利有弊”、“18 亿亩耕地红线应该废除”、“经济适用房既不公平又无效率”等观点，经他提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议。

很多人会问：茅于軾的观点从何而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2009 年 1 月前后，我们发起了为茅于軾先生八十岁生日征文的活动，得到了很多熟悉或陌生朋友的支持。他们撰写的关于茅于軾先生的学术贡献、思想观点和生活故事的文章，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作者来源之广，足以全面反映茅于軾的思想和为人。作者中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也有事业成功的企业人士；有和茅于軾相知多年的同事朋友，也有和他从未谋面的青年学生；有从业多年的媒体记者，也有奔波劳碌的上班一族……那些与茅于軾素不相识的普通人的经历和感受，尤其值得更多的普通人去阅读和思考。

让每一位读者在阅读本书后完全改变对茅于軾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非常期望，那些对茅于軾的观点只有初步印象或一知半解的人，可以通过本书对他的思想和理念产生兴趣，并作进一步的了解。为此，我们在书中特别强调他的思想渊源与学术背景，并列举了他的主要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作进一步的阅读。

我们当下所处的网络时代，民众对公共话题的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争议茅于軾的观点，是因为这些观点涉及很多人的利益。对于公共决策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不过，要使公共讨论产生好结果，准确理解彼此的观点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我们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人们

阅读茅于軾其他著作的路标。当然，也希望读者用同样的方式去理解每一位在公共话题中被关注的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

对熟悉茅于軾的著作和思想的读者来说，本书关于他的生活故事与生平记忆的内容具有特殊的阅读价值。除了同事旧友的回忆，茅于軾亲自为本书撰写了两万多字的文章《八十回望》——这是他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个人经历与国家变迁的深切回忆与真情告白。对于希望深入了解他内心世界的读者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文字记录。

在茅先生的自述之后，我们对他的学术背景和思想渊源进行追溯；然后，对他近两年来饱受争议的观点和现象进行分析；接下来，展现他在各个时期与学术同道的交往，以及他的思想和著作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再下来，讲述他“为穷人办事”的故事；最后，通过与他交往或接触过的人的观察，反映他在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了完整地反映这些主题，除了收集到的征文，我们还补充了一些已经发表过的媒体报道，在此，向这些文章的作者表示感谢，希望不会遭到他们的责怪。

大约半年前，在发起为茅于軾先生八十岁生日征文活动的时候，我们写道：“茅于軾先生的思想、人格与行动，在这个由封闭转向开明的时代具有非凡的示范意义。他为推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所做的努力，应该得到最高的尊敬。”

今天，如果读者拿起这本书，并开启了更长的阅读之旅，希望他们相信：茅于軾先生倡导的平等自由理念，他所秉承的宽容博爱精神，他所表现的求真务实行动，是引导中国社会走向繁荣与和谐的必由之路。

如果读者对本书有建议或要求，请发邮件到 yenching.cn@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各方读者的回应。

编者

2009年6月8日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 1

八十回望

我的爸爸妈妈 / 3

一辈子的“吃” / 5

挨 饿 / 7

学习和教育 / 9

爱人赵燕玲 / 12

当右派 / 16

文化大革命 / 18

扶 贫 / 20

天则经济研究所 / 23

衰 老 / 24

学术总结 / 25

对中国社会的展望 / 30

思想溯源

遥望茅于軾/岑 科 / 34

平实以致远——记茅于軾先生的生平与学术/何 帆 / 39

《择优分配原理》——茅于軾与我/平新乔 / 47

帕累托最优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悖论 / 樊 纲 / 51

茅于軾的桃花源 / 岑 科 / 54

风口浪尖

谩骂者自辱 / 张冷习 / 70

“保护富人”的未尽之意 / 杨支柱 / 74

多一份知识，多一份度量 / 熊建明 / 78

求真路上的坚定行者 / 张汇泉 / 84

素昧平生的仁者与勇者——记茅于軾先生 / 梁立俊 / 87

中国文化里的“螳螂吃夫” / 牟宗勇 / 90

他的心向着骂他的人 / 刘 彦 / 93

“炮打茅于軾”之社会病理分析 / 笑 蜀 / 97

我所认识的茅于軾 / 任志强 / 104

绅士茅老 / 秋 风 / 109

从茅于軾先生的视角谈“剥削” / 陈志武 / 111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战士 / 周年洋 / 115

为人师友

我治学为人的楷模——茅于軾先生 / 张维迎 / 122

如兄之友，如父之师 / 张敢明 / 126

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同时是一个高尚的人 / 盛 洪 / 134

杨小凯与茅于軾：平生风谊兼师友 / 谢志浩 / 140

茅于軾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 徐滇庆 / 147

未敢忘记的关照 / 于大海 / 150

知识分子的楷模 / 张 欣 / 153

茅老其人 / 冯兴元 / 155

年轻人茅于軾 / 李 实 / 158

经济学的素养 / 周业安 / 160

我智识生活里最难忘的篇章 / 龙希成 / 163

- 与茅于軾教授同行/段绍译 / 172
 影响我一生的人/刘万军 / 177
 知行合一的儒者/李英强 / 181
 一身风骨，垂范后学/温克坚 / 187

播种观念

- 大师为我启蒙/王治平 / 190
 真正的思想者/张文学 / 193
 阳光茅老/滕彪 / 195
 读《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徐斌 / 198
 偶遇《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杨雪 / 201
 给你所爱的人以真理/王力 / 204
 作为制宪与文化复兴工具的择优分配最优化原理/段振坤 / 211
 记茅老师的一次演讲/黄志伟 / 215
 育人无声/盛福济 / 217
 特殊的致敬/周建洪 / 219
 宣扬“价格万岁”的勇士/李俊 / 221
 以茅先生的视角看救市/陈健颖 / 223
 我所理解的茅于軾/肖重发 / 226
 曾经误解/顾彬 / 230
 思想着的人永远年轻/陈青蓝 / 233
 自由经济思想的传播任重道远/徐昌生 / 235

知易行难

- 我与茅老师的扶贫之路/汤敏 / 240
 十五年历程，见证茅老“为穷人办事”/李乃伟 / 243
 仁爱之师/刘肃平 / 247
 茅老改变了我/李林顺 / 250
 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长寿/邹啸鸣 / 252

- 茅于軾的“小额贷款梦”/韩志峰等 / 256
大经济学家办小保姆学校/李彦春 / 262
一个 NGO 的中国式生存/赵小剑 / 268
茅于軾和《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熊伟 / 272
对教材垄断的一次宣战/信力建 / 276
效率最高的经济学家/刘兴成 / 279
传统与现代的契约精神/江小鱼 / 281
真实与宽容/苏小和 / 283
白发英雄照夕阳/郭梓林 / 287

生活本色

- 记茅于軾先生/萧瀚 / 290
难忘的“老板”/唐杰 / 294
他还骑自行车吗？/余不诤 / 296
我的贵人茅于軾先生/陈大鹏 / 301
敬重茅于軾/宋怀烈 / 305
茅于軾印象/周克成 / 311
为我交学费的老人/陆思同 / 315
用心良苦/周双文 / 317
我和茅老师的两次见面/李超 / 319
平易近人的茅老先生/张勇 / 321
茅老劝我别灰心/徐亮 / 323
温良如玉茅于軾/欧阳君山 / 326
淡定的幸福/史洁 / 329
写给舅舅茅于軾/徐安泰 / 334

附：茅于軾主要著作一览 / 336

八十回

ba shi hui wang

八十回望

我到底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想。最近我得出了结论：确实有所不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不同。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在传送道上往前走，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有别人挡道）时就停下来了，而我却绕过他们继续往前走。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水平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再一点我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有一次我们3点45分就上了飞机，要飞3个小时。可是刚起飞不久，4点多钟时乘务员就开饭，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还是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后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

我的这两点不同，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这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我从小就有。1950年，我刚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时，每天下班后要有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最不愿意参加政治学习，每到这一学习时间，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而我却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六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了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著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大伯父叫茅以南，20世纪50年代初就去世了。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大房有八个，二房有七个，再加我们这房四个。这19个叔伯兄弟中出了三个右派，比例远高于别的家属。这跟茅家历来的自由思想有关。我还有一位姑妈，叫茅以纯，她很不幸，1941年在抗战中去世了，活了不到40岁，她生了两个儿子，姓戴。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只活了60多岁，我很小的时候得知他去世，那时候我们在杭州，爸爸特别去南京奔丧。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并且鼓励我写好字。我每天要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就给我一个铜板。我直到今天仍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这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她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去世，终年七十岁。应该说，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居家贫困，但是她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三个儿子都是留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时间都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舒坦。

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他原在唐山交通大学，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学成后去了加拿大

实习，最后从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他回到南京老家后，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这本来应该很赚钱，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公私业务繁忙，对修车的需求很强，但是国民党官僚依仗权势，强买强卖，没有保护伞就做不成生意。父亲开修车铺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被抓去坐牢，后来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那时候二伯父茅以升正在杭州修建钱塘江大桥。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他负责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去日本购买机车，去美国引进“二战”战后的铁路物资，开办柳江机车厂。他的工作作风勤劳廉洁、一丝不苟，故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解放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这是他一辈子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但是因他是非党人士，有职而无权，所以解放后虽然他满腔热情，却没有可能做成什么事。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更谈不上做事了。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

我爸爸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解放前铁路的机车车辆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各个国家的都有。由于各国的标准不同，车辆就无法连接。比如车钩的高度不同，常常发生列车分离的事故；制动风管的连接十分困难；检修零件因为标准不同，不能统一备制，等等。标准化的工作从解放前一直继续到解放后，做了几十年。他在工作作风方面，廉洁奉公，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人富有同情心。这些特点在茅家多多少少是普遍的。这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

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陈章看上了他，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陈家也是苏州名门。我的外祖父陈希濂是光绪时的进士，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中进士的报喜照片。陈章教了一辈子书，解放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解放后继续作南京大学教授。大舅舅陈霆锐也是美国留学生，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相当于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母系的状况。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竭力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她机智幽默，爱护子女。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却十分融洽。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而且都有留学生的背景（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的，且崇信科学。

一辈子的“吃”

在过去的80年里，生活好的日子并不多。在我开始记事之前，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一个月拿近500块钱工资，家里有两个保姆。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我记得大约在1938年，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作伤兵病院。这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我们小学生去慰问，送面包给他们吃。有些受轻伤的伤兵，伤好一点儿之后，就自由上街。他们有时候也会闹事、打人。他们的心情很不好，因为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不知道今后的生活怎么办？由此可见，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楚怡小学当时在长沙是一所相当有名气的小学，教学质量很高，有一个大操场，还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朱镕基也在那儿上过学。我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姓陈，他还借过我家的照相机回乡间老家去照相。湖南人语文水平高，字写得漂亮。那时候也正是我祖母教我写字的时候。前几年我回去访问时，学校已经今非昔比，显得相当败落，看样子马上就要关门了。

抗战以后，物价开始上涨。我们家从长沙搬到桂林时，记得父亲在亨德利钟表店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一只欧美茄手表，店家附带赠送一个小座钟，可见那只表的价值不菲。那只表后来戴在了我的手上。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一直戴着它，虽然修理过许多次，还是走得很准。我在佳木斯开火车时还用着，一直用到结婚后，才买了一只日本表，性能比它好，就不再用它了。这只表最后在改革开放之后以15块钱卖给了收旧货的，当时觉得卖了一个好价钱，后来才知道卖得太便宜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名表是可以当

古董卖的。

等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父亲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负担是很重的。抗战时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学校里的伙食非常差，经常吃不饱。桌上的饭是定量的，如果吃得慢，别人就会抢先把饭吃完了，自己只好饿肚皮。至于吃肉，那是一件极奢侈的享受。我走过校门口时经常看见小摊上挂着油光锃亮的猪蹄子，馋得直淌口水。在桂林汉民中学上学时，同班同学（忘记了名字）每个星期日带我回他的家（我家在柳州），他母亲总是炒两个菜，一个炒肉丝，一个炒鸡蛋，供我们两个大吃一顿。他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的孩子，让我跟着吃。对于这件事，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八年抗战，吃一直是大问题，挨饿、嘴馋始终伴随着我。附带说一句，抗战虽然十分艰苦，但是没有饿死很多人，个别人饿死肯定是有的，也只不过几万，顶多十几万，绝不会有几百万、上千万。直到抗战胜利，学校的伙食才忽然大大地改进。那时候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每顿饭都有荤菜，最经常吃的是地瓜炖肉。那时美军的剩余物资在市面上出售，有奶油、冰淇淋粉、蛋粉等，价钱便宜，营养丰富。可是和平的好景不长，一年后国共内战开始，生活又开始走下坡。那时我已经进入上海交通大学，食堂的伙食很糟糕，幸亏美军的剩余物资供应充足，大学生经常吃美军的 Ration（配额给养），一个涂蜡包装的纸盒子，重量不过一两多，但是营养足够一个成人所需。里面有几片饼干、一个肉罐头、一块巧克力、几支香烟和一卷手纸。盒子里的内容物不是千篇一律的，每次打开，像挖宝藏似的，总想发现一些新东西。美军的剩余物资除了吃的，还有穿的、用的，为当时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缓解了物资供应的紧张。对比之下，大家也对美国生产力之强大有了切身的感受。

抗战期间我最想念的是巧克力。自从1940年我们兄弟几个从上海回到重庆以后就跟巧克力绝了缘。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坐飞机到上海，下飞机后头一件事就是买一块巧克力吃。至今巧克力还是我的所爱，不过年老了，不宜多吃糖。附带说一句，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整个暑假因为我弟弟得了盲肠炎，所以我陪伴他两个多月，没

有时间复习，以致考得很不理想，只是勉强录取，而且还取在工商管理系，到二年级才转到机械系。

1949年，全国解放后生活又开始好转，那时我到了齐齐哈尔。但东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里经常吃高粱玉米，细粮是特殊待遇。我经常上馆子，因为没有生活负担，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吃的上面。1954年，我爱人赵燕玲从苏州来到齐齐哈尔，她从小没吃过苦，对高粱玉米难于下咽。除了继续上馆子，还叫家里从苏州、北京寄食物，肉松、板鸭、糕点、糖果，甜的、咸的，从来不断。两个人挣的工资吃掉了一大部分。不过解放初期工资每年都涨，生活并不困难。次年我们两人先后调来北京工作，1956年工资改革，我的工资涨到133.5元/月。1957年我又出版了头一本书《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拿到1600块钱稿费，合十几个月的工资，那时候是我们收入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当了右派，我被降职降薪，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我们的头一个孩子出生了，生活一落千丈。

挨 饿

1960年，三年灾荒的第二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不过右派被管得特别严，受的罪也最多。我们铁道研究院一起下放的大约有六七十人。我被下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灾荒时期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十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我们刚到的时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留下一个户主和他的大女儿，他的爱人和小女儿都在去年（1959年）死了。妈妈活着时能够保护孩子，妈妈一死，孩子就难逃一死了。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全家人都饿死了，只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孩子冬天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虽然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才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我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

更需要。

我们刚刚到藤县时，县里的领导设宴招待我们。从北京来的人还没有挨过饿，而当地百姓已经饿了一整年。我们和当地干部没有共同语言。当地的干部们口口声声说百姓有得吃，粮食不是问题。我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那天的宴会说不上有什么好菜，但是粮食是敞开吃的。我们当时，并不感觉敞开吃有什么奇怪，到了后来挨了饿，才知道敞开吃有多难得。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很少，记得只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因为解饿要有油吃。没有油，光吃粮食，肚子照样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因为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却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化到了野兽的状态。

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就喝水填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饥饿使我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这是有道理的。人饿急了，会不顾一切地进食，就有可能撑死。有一位华侨青年，肚子饿得不行，他妈妈从香港寄来一大包食物，他便不顾一切地吃，最后活活地撑死了。情况惨不忍睹。他妈妈来领尸，痛不欲生。我从藤县回到北京时，当天晚上我太太给我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我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我 11